

第一章 类型学与二语语法研究概述

第一节 类型学概述

语言类型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类型学研究是从跨语言的角度观察人类语言，通过跨语言比较寻找或验证语言共性，再从语言共性的视野更透彻地认识和揭示具体语言的特点。现代语言类型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发端以来，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产生了丰富的成果，逐渐成为当前语言学领域中影响最深远广泛的语言理论之一。类型学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语言特征，以这些特征为参项进行跨语言的调查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对这些特征的认识还是对世界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特征的认识都比以往深刻得多。这些重要的类型学特征很多既是汉语的特点，也是汉语二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如量词、结果补语（连动结构）、使役句等。本研究将结合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来讨论这些汉语二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以跨语言对比的深入研究以及类型学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基础，近些年来，类型学又在区域类型学、语义地图学等理论研究上有很大突破。这些研究为汉外对比、汉语二语教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在这方面受到很大启发，下面重点介绍这两个方面。

一、东南亚语言区域类型学特征研究

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是指在一个有着不同语系（语族）的语言的地理区域里，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语言在结构上因紧密和持久的接触而呈现出了一致性。

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地区，Enfield（2001、2005、2006）称为“Mainland Southeast Asia”（亚洲大陆东南部），地理上指的是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半岛、印度东北部地区、孟加拉国、中国南部及西南部的广大地区。Enfield（2005）指出过去两千年的移民、政治上的大变动、社会文化的接触和

汇聚等，导致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印度文化圈和汉文化圈相结合的区域，社会文化上显示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的特点。中、印文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体现在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东南亚是一个语言状况非常复杂的地区，有着不同系属的几百种语言，而被广泛承认的语言至少属于五个不同语系，即汉藏、台-卡岱（侗台）、南亚（孟-高棉）、苗瑶及马来-波利尼西亚（南岛）语系，这些语系中也包括了缅甸、柬埔寨、中国（指南方部分地区及西南地区）、老挝、泰国及越南等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民族语言。地域内悠久的历史、文化及语言的亲密接触，导致这个地区产生了语言的相似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语言区域。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该地区的语言系统上的相似性相当明显，属南岛语系的古语（Cham）、属孟-高棉语系的高棉语和属台-卡岱语系的老挝语这三种不同系属的语言在元音系统上很接近（Enfield, 2005）。可以说亚洲大陆东南部语言产生变异现象，东南亚语言之间因语言结构上的广泛扩散而导致它们有大量的共享语法结构，语音、语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整体类型到具体类型都有体现。就因为如此，这一地区受到了语言学界长期的关注，成为一个著名的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已有大量成果专门研究亚洲大陆东南部语言区域特征，代表性的研究有（转引自 Enfield, 2005）：Henderson（1965）考察了东南亚语言的语音体系及词态学；Matisoff（2004）研究了语义类型方面；Clark（1989）研究了句法方面的相似性；Bisang（1992）及 Enfield（2003）研究该区域动词语法化路径的共性，Enfield（2005）概述了东南亚语言形式特征等。

对亚洲大陆东南部语言区域不同语言所共享的特征，学界有共同认识，Enfield（2001）将其概括如下：第一，缺少格标记或者同指指称；第二，对语句的理解主要依赖于语境和语序，省略现象常见；第三，具有量词结构；第四，具有连动结构；第五，在语音系统上，声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六，辅音韵尾有严格的限制，只有一部分辅音能出现在韵尾的位置上。

语言区域的形成是长期的语言接触造成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有超过一种的语言在使用，就会出现语言间的接触，语言由于接触而可能出现变化，以往认为词汇是最易因语言接触发生变化的，而语法系统则很难受到语言接触影响，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语言的所有要素都可以因语言接触而发生变化，语音系统、形态系统、句法、语义都可能受到影响。近年来对于世界著名语言区域内语言特征的调查描写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 Thomason（2001）、

Aikhenvald & Dixon (2001)、Hein Bernd & Kuteva Tania (2005)。从后面第二章、第三章对亚洲大陆东南部语言区域的语言特征的介绍中也可看到这一点。语言接触中语言接触双方会因交际需要而形成一个语言社团, 如果该社团选择一方的语言进行交际, 这样对另一方来说就会有一个不断学习和接近第二语言的过程, 而在使用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会带进其母语的特征, 这一过程虽不同于真正的二语学习, 但有很大相似性, 其语言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中介语, 而为交际的方便, 交际双方都可能使用这种特殊的中介语。以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些理论观察和解释语言接触中的一些语言变异或语言演变, 也是近年来语言接触研究有新的发展的一个方面。

二、语义地图模型的相关概念

语义地图模式 (semantic map model) 或称为“心智地图” (mental maps)、“认知空间” (cognitive space)、“认知图” (cognitive maps) 是近十年来语言类型学领域兴起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工具, 也是一种建立在跨语言比较基础上的研究语言多功能形式关联模式的新工具, 其研究对象为多功能语法形式 (multifunctionality)。“多功能形式”, 指语言中某个编码形式 (词汇形式、语法成分、语法范畴以及结构式)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而相关的功能。语义地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揭示人类语言多功能模式的变异和普遍特征, 特别是不同的多功能变异模式背后的跨语言规律性。M. Haspelmath (2003) 对语义地图理论有系统阐释, 近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对此理论多有介绍和运用, 本节主要参考张敏 (2010)、吴福祥 (2011) 介绍语义地图理论及语义地图的几个重要概念:

概念空间 (conceptual space) 是通过跨语言比较建立起来的普遍的语义空间, 是语言中特定编码形式诸如词汇语素、语法语素的不同功能及其相似关系构成的几何性概念网络。概念空间中存在一系列的节点, 而节点之间由线段相联。所谓的节点代表不同的功能 (或语义), 而线段表示功能之间的直接关联。概念空间中的不同功能的区域位置及连接方式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所有语言都是将其相关编码形式的不同功能放在同一概念空间之上。

语义地图 (semantic map) 与概念空间不同, 语义地图是针对特定语言而言的, 它是特定语言相关编码形式的多功能模式在概念空间上的实际表征, 体

现的是不同语言对同一概念空间的不同切割方式。我们可以在概念空间上绘出某种具体语言的编码形式的语义地图。

邻接性要求 (contiguity/adjacency requirement) 也可以理解为“语义地图连续假设”，具体来说就是多功能形式的不同功能在概念空间中必须连接。反映在具体语义地图上则是，任何一个语言中相关编码形式的若干功能必须占据概念空间内的一个邻接区域。

张敏(2010)指出，展示在语义地图中的那些功能应是系统的、普遍的，反映了人类语言在概念层面的共性。而这种反映是建立在蕴涵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之上的。蕴涵的概念来自逻辑学，如果有现象 P 就一定有现象 Q，而有现象 Q 不一定有现象 P，那么就说现象 P 蕴涵了现象 Q。著名语言类型学家格林伯格把这种蕴涵规则应用于研究语言中某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他发现，如果语言中存在某一种语言现象，则一定会存在另一种语言现象，反之不然。语言中具有这种蕴涵关系的共性就是蕴涵共性。

第二节 类型学视野的二语语法研究概述

类型学理论用于二语习得与教学研究，主要是用于验证第二语言学习的预测效度，从类型学视角解释中介语特征，并尝试揭示语言类型学规律与语言习得规律之间的关系。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类型学研究成果就被引入二语习得与教学研究领域。Comrie、Eckman、Ramat 等学者的研究将类型学中“蕴涵共性”“标记性”“语法层级”等核心理论以及一些具体的类型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在二语习得顺序、习得难点的预测和解释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如 Keenan and Comrie(1977)、Hawkins (1987)、Eckman (1977、1991) 等。孙文访(2012)曾总结了语言共性和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认为二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语言类型学中概括出的语言共性及其变异形式可以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为预测二语习得中的各种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参项，提升二语习得及中介语研究的理论高度；第二，学习者的语言可作为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样本，二语习得的过程可为语言类型学提供一个潜在的窗口，也可以作为语言共性研究和语言类型变异趋向的试金石，对习得过程的考察可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和人类的认知有更多了解。

可以看到, 类型学在与二语习得研究相结合的开始阶段, 研究的重点在讨论类型学研究与二语习得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理论意义, 主要成果偏重以二语习得与教学的实证研究验证类型学得出的语言共性。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一理论如何与二语教学的应用研究相结合、这一理论在该应用领域的长处与局限就是研究者将会触及和探索的问题了。Mouton de Gruyter 出版社 2003 年出版了 Anna Giacalone Ramat 主编的《类型学和二语习得》(*Typ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一书^①收录了 11 篇运用类型学研究二语习得的文章, 这些文章多以十分具体而细致的二语习得个案研究为主, 集中了近期语言类型学家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种种探索, 反映出类型学视野的二语习得研究正走向深入和成熟。

不少汉语学界的学者也意识到语言类型学对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性, 朱永平(2004), 尹洪山(2004、2005), 张铭润(2012), 孙文访(2012), 王勇、周迎芳(2014) 等对国外运用类型学理论研究二语习得的成果特别是 20 世纪的探索有详细评介。朱永平(2004)、尹洪山(2004、2005) 认为语言类型学的标记关系是影响二语习得顺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习者通常先习得无标记或标记度较低的语言项目, 然后才会习得有标记或标记度较高的项目, 这种自然习得顺序应该应用于课堂教学中。朱永平(2004) 还运用语言类型特征解释了美国学生习得汉语声母的难度等级, 指出这个等级不一定是来自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不同, 而是来自某个形式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中的语言特征的不同。一旦第二语言习得者的难点被预测到, 设计适宜的教学法就会有助于学生克服难点, 尽快掌握所学语言。张铭润(2012) 指出类型学中的“蕴涵共性”“标记理论”“语法层级”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运用这些理论对中介语语音、句法的习得进行预测和阐释, 结果发现, 类型学共性对二语语音、句法习得的顺序和困难有较高的预测效度。王勇、周迎芳(2014) 虽然认同语言类型学和二语习得之间的互动是理论和应用的关系, 但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一方面, 语言类型学中很多现象有待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去验证, 目前已有的研究只是语言系统中极小的一部分, 如关系从句、屈折变化形态、小句连接等; 另一方面, 不能过分夸大语言类型学对二语习得研究的作用, 因为语言类型学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 更多的问题还需要

① 本研究中以 Ramat (2003) 代指此书。

类型学理论及其他理论互相补充、共同解决。孙文访（2012）从语言类型与第二语言习得的互动、基于语言共性的中介语研究、蕴涵共性与第二语言习得顺序，以及类型标记性与学习难点的预测四个方面对国外影响较大的、基于语言类型学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以期为国内汉语习得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前述几篇文献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类型学运用到二语教学研究领域的意义，而且就我们所查阅的文献，在类型学引入二语教学研究领域初期，这类研究更多的是见于英语教学领域。近几年随着汉语类型学研究的深入，汉语的诸多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语法特征被揭示出来，汉语本体研究成果的丰富也推动着汉语二语教学研究的发展，集中出现了一批运用类型学研究汉语二语语法习得的成果。

林华勇、吴雪钰（2013）以普通话多功能词“到”的习得顺序为例，探讨跨语言比较背景下的语义地图模型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运用，论文分别绘制了普通话、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中“达至”义语素的语义地图，在此基础上，对日、韩、越三国留学生普通话“到”的习得顺序进行观察和比较，找出习得难点并做出解释。孙建华（2014）对英、俄、韩三种母语背景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关系从句习得进行了实证研究。李昱（2014）重点考察汉语学习者所使用的和与格标记相关的双及物变异形式、与兼语构式相关的双及物变异形式、与介词结构相关的双及物变异形式，在语言类型学对双及物构式的研究基础上，对汉语中介语中与双及物构式相关的语言变异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发现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类型对变异形式有很大影响。文章还吸收库藏类型学相关理念，指出由于受到语言库藏的局限和不同形式间显赫程度的差异，中介语中的变异形式有其特定的变异空间，受到变异机制的调节。郝美玲、王芬（2015）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运动事件表达的习得情况，文章选取来自S型语言和V型语言的汉语学习者，让他们叙述“青蛙的故事”，通过分析与比较他们在叙述运动事件时对运动动词和参照信息的选择与使用，来具体考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叙述汉语运动事件时是否会受到母语类型特征的影响？第二，运动事件的哪些成分容易受到母语特征的影响？第三，母语特征的影响是否会受到汉语水平的调节？文章发现母语背景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汉语典型的M+P结构的使用和对参照信息描述的详细程度这两个方面，S型语言组的M+P结构的使用随着学习者汉语水平的升高大幅上升，同时其他结构类型的使用比例下降明显（尤其是Monly结构），而V型语言的学习者则

没有太大变化,说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S型语言学习者较早洞察到汉语运动事件表达常用的句法结构,较先接近汉语母语者的语言使用习惯。鹿士义、高洁、何美芳(2017)同样通过让英语、西班牙语、日语、朝鲜语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以及汉语母语者讲述“青蛙的故事”的方式,考察不同语言类型背景学习者对汉语运动事件表达的习得情况。试验结果显示,不同类型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在表达汉语运动事件时偏误最多的是M+P的使用,S型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被试的偏误集中在路径动词的缺失上,在表达汉语运动事件时路径表达的偏误要远多于方式的偏误。V型语言如日语、朝鲜语被试在表达汉语运动事件时常常出现路径终点表述的偏误或缺失。这与S型语言凸显方式、V型语言通常不允许方式与路径终点融合这一特点有关。程潇晓(2017)基于大规模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对朝鲜语、蒙古语、日语、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五种母语背景汉语学习者易混淆路径动词进行考察,文章重点考察指示路径动词与无指示路径动词的混用(即由“来/去”构成的复合趋向动词与简单趋向动词的混用)、趋近与背离路径动词(即“来”“去”及其构成的复合趋向动词)之间的混用,主要结论是,由于二语者不清楚汉语指示路径动词和无指示路径动词的语义差异,所以误用指示路径动词普遍出现于述宾结构中,同时受汉语连动结构的影响,误用无指示路径动词出现在连动结构中,而印尼语背景学习者还受印尼语指示编码策略的影响,倾向于使用无指示路径光杆动词,并常遗漏宾语。而趋近路径动词和背离路径动词的误用多表现在学习者受汉语兼语结构的影响,常在兼语结构中误用趋近路径动词。吴建设、莫修云(2018)做了关于“把”字句习得的实证研究,作者选择丹麦语、朝鲜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通过实验探讨两个问题:语言类型是否会影响汉语学习者的“把”字句的使用、语法知识学习及判断信心;“把”字句的使用是否与学习者词汇知识、语法知识及判断信心存在显著相关。研究发现,SVO型的丹麦语背景被试比朝鲜语背景被试使用“把”字句更多,但语言类型对学习者相关的语法知识的认识等方面并没有影响。文章特别分析了朝鲜语母语背景对学习者的“把”字句的复杂影响,指出虽然朝鲜语存在SOV语序,与“把”字句表面有相似之处,但两种结构对名词有不同的限制,正是朝鲜语的语言特点造成了朝鲜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回避使用“把”字句。高顺全(2017)考察了不同语言类型母语背景学生对汉语介词这一特点的习得情况。文章从中介语语料库中提取母语分别为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以及日语和朝鲜语的汉语学习者的语料，其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是 VO 语序、前置词语言，日语、朝鲜语是 OV 语序、后置词语言，通过对两组汉语学习者对“在……上”使用偏误的分析，作者提出偏误蕴涵假设：VO 语言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框式介词时会误加前置词，但很少误加后置词；OV 语言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框式介词时，既会误加后置词，也会误加前置词。郭风岚、刘辉（2017）通过对中介语语料库的调查分析了中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在语序偏误方面的类型学成因。研究指出，母语语序类型与汉语差距越远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基本结构层级语序（即主谓、述宾结构语序）时偏误率高，但在次级结构语序（即定中、状中、中补结构语序）特别是状语语序上，各语言类型的汉语学习者都不易正确习得。这和人类语言在次级结构语序上表现复杂有很大关系。

综观类型学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类型学理论影响下的二语语法习得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类型学研究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首次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就是关系小句的习得顺序与类型学的蕴涵关系一致，Ramat（2003）一书中收录的 11 篇论文，除一篇是讨论语音问题外，其余都是讨论语法问题的。从上段列举的文献也可看到，类型学在汉语二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也主要是语法方面。下面将就已有的研究，概括总结类型学在二语语法习得研究中的价值、范式、优势特点及其局限性。类型学视野的二语习得研究在研究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上都有突出的特点，在结构或形式的语法意义的正确习得、母语及目的语对二语习得影响方面有深入探讨，下文就这四个方面进行讨论。^①

一、研究的问题

已有的类型学视野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涉及关系小句、疑问句、动名词、动词的情状表达、不定代词功能、领属结构、话题结构、篇章的叙事视角、篇章的复指方式、运动事件表达、语序等，这些语法特征都是语法系统中基本的、关键的结构特征，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但不同类型语言中又有不同表现。这与只从二语教学出发所关注的问题虽有交集，但并不完全相同。从类型学视

^① 鉴于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国外类型学与二语习得研究进行了介绍，下文的概括主要基于 Ramat（2003）和国内汉语二语教学的相关研究。

角，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问题。如与篇章信息组织相关的话题结构、篇章的叙事视角、篇章的复指方式等句法特征，这些句法特征需要更多地联系语篇描述其功能，它们独立的形式特征不突出，以往二语教学实践与研究都很少注意到，但在跨语言的对比中，这些句法特征的差异性突出，显示出它们在句法系统中的重要性。Talmy(1985、2000)对人类语言运动事件表达类型的概括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内外都有一些研究通过二语习得来讨论人类对同一运动事件是如何感知和表达的，上述郝美玲、王芬（2015），鹿士义、高洁、何美芳（2017），程潇晓（2017）都做了关于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习得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与汉语学界近十年关于汉语运动事件表达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有关。类型学视野的二语习得研究关注有类型学意义的语法特征的习得，推进了二语习得关注的语法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鉴于所关注的句法特征的重要性，相应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和语言学本身都是很有意义的。如 Yasuhiro Shirai 和 Yumiko Nishi (Ramat, 2003: 267-290) 根据 Vendler 在 1957 年提出的体范畴的四分情状系统及其语义特征对比了英语和日语的动词，指出英语、日语的活动动词差异不大，而状态动词的差异很大，作者进一步提出这一特点有跨语言共性，即活动情状表达在各语言中差异相对较小，提出可从活动情状和状态情状表达的跨语言比较来观察不同母语背景的学生学习日语体结构的情况，这可能是解决有关体的句法结构习得困难的新的方法，而这正是以往二语习得研究所缺乏的。

又如，Rosanna Sornicola 关于话题结构和左偏置结构（left-detachment constructions）的习得研究（Ramat, 2003: 327-364）指出，由于这两类结构有很强的语篇功能，具体使用中表现出丰富的功能，观察和研究其习得并不容易，因此作者最后对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提出改进，认为可以选择在成人二语习得、儿童二语习得以及成人一语习得的平行对比下进行形式-意义关系的分析。

Comrie 在其较早的研究中发现，关系小句的二语习得顺序与类型学揭示的小句关系化的跨语言蕴涵共性一致，是非常有影响的研究。^①而在进一步的研究

① 尹洪山（2004、2005），张铭润（2012），孙文访（2012），王勇、周迎芳（2014）对此有详细介绍，可参看。

中 (Ramat, 2003: 19-38), Comrie 指出, 二语习得研究反映出, 中心名词在主要小句和关系小句中句法功能一致的关系小句, 比功能不一致的关系小句更容易习得。比如, 下面前两例的习得就比后两例的习得容易:

The **man who** saw the rabbit caught the fox. (看见兔子的男人抓住了狐狸)

The fox caught the **rabbit that** the man saw. (狐狸抓住了男人看见的兔子)

The **fox that** the man saw caught the rabbit. (男人看见的狐狸抓住了兔子)

The man saw the **fox that** caught the rabbit. (看见狐狸的男人抓住了兔子)

这说明除了以前揭示的普遍蕴涵关系外, 影响关系小句习得的还有别的因素, Comrie 所做的这项研究显示: 第一, 中心名词在主要小句和关系小句中的句法功能都对关系小句的习得等级顺序至关重要; 第二, 如果中心名词是主要小句中的宾语, 同时又是关系小句的主语, 对这样的主语的关系化会比对直接宾语的关系化要困难。Comrie 指出这样的结论适用于解释关系小句类型的跨语言分布。

相比较来说, 类型学的汉语二语教学研究则对研究具有的语言学意义重视不足, 更多关注研究结果对汉语二语教学的意义。

二、研究的范式

从已有研究看, 类型学理论影响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其研究范式有二: 第一, 印证类型学所揭示的跨语言蕴涵共性特征; 第二, 以类型学研究框架为指导, 对比分析母语和目的语的相关语言项目, 讨论目的语该项目的习得特点和规律, 这必然要涉及母语、目的语语法特征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

第一类的代表性研究便是 Comrie 等人对关系小句的习得研究, 关系小句的习得顺序反映了类型学对名词短语的关系化编码难度等级序列, 该序列如下:

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旁语>领属成分

类型学研究指出, 上面的序列中, 左边比右边的句法位置更易形成关系小句, 如果一种语言可以在这个等级的某一位置上构成关系小句, 那么它也能在等级中所有靠左的位置上构成关系小句。比如, 如果一个语言有直接宾语关系小句, 那一定有主语关系小句, 以此类推。Comrie 指出习得研究反映出该序列可以转换为对关系小句习得模式的预测, 即首先习得靠左的位置上的关系小句, 即主语关系小句, 然后是直接宾语关系小句, 以此类推。这一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扩展, “用在日语、

朝鲜语、汉语粤方言关系小句的二语习得研究中，却不具有在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预测效度，这引发了对东亚诸语言关系从句是否存在缺位(gap)的新思考”(张铭润, 2012: 116)。

Girliano Bernini 考察了意大利语二语学习者的不定代词的功能和语义的发展状况(Ramat, 2003: 83-124), 文章引用 Hsapelmath1997 年基于 40 种语言的跨语言对比研究所得出的不定代词的语义功能的语义地图, 观察描写了 8 个[12 岁到 48 岁, 四男四女, 第一语言分别为德语、提格里尼亚语、汉语吴方言、多语者(英语、汉语粤方言、马来语)]意大利语二语学习者不定代词的习得情况, 指出意大利语二语学习者不定代词的功能发展所体现出的倾向, 部分可以用类型学框架下的蕴涵地图理论来加以总结。Hsapelmath 基于 40 种语言的对比, 提出不定代词有九种功能, 其功能远近关系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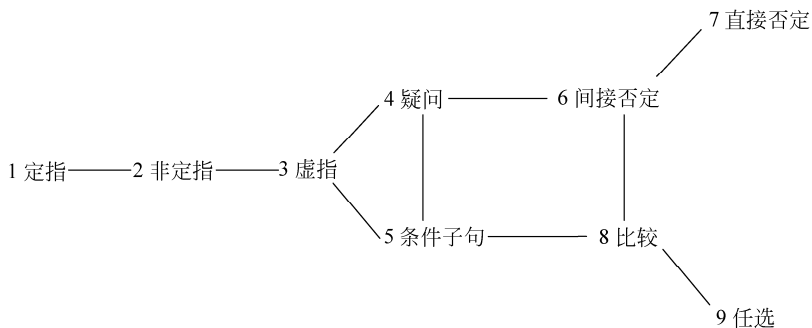


图 1-1 不定代词功能图

具体来说就是, 功能 1——所指对象存在且身份明确、说话人可以识别该对象; 功能 2——所指对象存在且身份明确, 但说话人不能识别; 功能 3——说话人不能肯定所指对象存在; 功能 4——该代词用于疑问句; 功能 5——该代词用于条件句; 功能 6——该代词用于否定的从句; 功能 7——被否定的不定代词是否定句的一个论元; 功能 8——该代词用做比较基准; 功能 9——该代词有任指义。

意大利语中有 3 个不定代词, 其中肯定形式 qualche 有功能 1、2、3、4、5、6、8, 二语习得顺序显示其功能由功能 2 向其他功能发展, 如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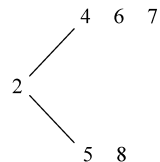


图 1-2 意大利语不定代词功能二词习得顺序

图 1-2 是图 1-1 的一部分，基本反映了语义地图连续性的特点与要求，体现了语义地图理论的基本假设：概念空间反映了人类语言共性，图 1-2 还显示二语习得者发展出了 *qualche* 所无的功能 7，该功能与意大利语的否定代词 *nessuno* 系列的功能发生重叠，这一情况发生在二语习得的高等级阶段，是语言经济性作用的结果。^①

类型学上的无标记结构比有标记结构更早习得，这一点观点由 Eckman 提出并已被广泛接受，且有不少实证研究。Anna Giacalone Ramat 也以此来对意大利语动名词的二语习得情况进行解释 (Ramat, 2003: 181-220)。动名词在意大利语口语和书面语中都是相对常见的动词的非限定形式，但是很多情况下，在动名词该出现的位置上也可以出现相对应的限定结构，因此动名词是一种可选结构。根据类型学及类型学上的标记理论对动名词的认识，动名词作为一种副词性从属语，比限定形式更有标记性，因此可预测动名词作为有标记的形式比限定动词更晚习得。这种预测为意大利语的初级习得阶段很少出现动名词的事实所证实。同时，在动名词的习得中，表示情态或者伴随状态的动名词最早出现，而且被学习者更为偏爱，而这些功能是动名词功能范畴中的原型成员。

上述研究从人类语言的蕴涵共性出发，旨在揭示语言习得中的共性规律。与基于对比语言学的二语教学研究不同，类型学视野下的该类研究并不特别关注具体语言中语言特征的具体形式表现及其对应关系，而更关注跨语言的蕴涵共性对语言习得顺序的预测力。

类型学与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第二类研究范式是以类型学研究框架为指导，对比分析母语和目的语的相关语言项目，揭示出它们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讨论二语习得问题。

Mary Carroll 和 Chrictiane von Stutterheim 讨论了信息组织原则的不同类型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Ramat, 2003: 365-402)。文章对比描写了英、法、意、西、德五种语言的叙述事件的视角，指出德语是以空间为叙述视角组织相关信息，而其他四种语言以对象为叙述视角。研究表明，即使高等级学习者已经掌握相关的叙述形式，但对叙述视角、信息组织原则的习得仍很缓慢。学习者仍然深

^① 二语习得者使用的 *qualche* 的功能 7 在功能 2、功能 4、功能 6 之后发展出来，与图 1-1 无定代词的整体语义图相同，也说明语义地图反映的功能远近关系有认知发展的基础。

受母语组织信息原则的影响。比如，很多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习得德语，尽管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对于德语中的空间视角结构的习得并没有到相应的水平。这些学习者以对象为基础的视角在其德语的信息组织中占优势，如同在其母语西班牙语中一样。母语为英语、西班牙语的德语学习者的情况显示出，其母语中对空间为基础的视角的使用限制被转移进了其目的语学习中。

Yasuhiro Shirai 和 Yumiko Nishi (Ramat, 2003: 267-291) 根据 Vendler 于 1957 年提出的关于体范畴的四分情状系统，对比了英语和日语的动词系统，指出日语和英语相比，状态动词更少，英语里的状态动词在日语里常用在动态动词后附加-tei-来表示。-tei-本身是日语中的延续性未完成体标记，还可附加在达成动词上表结果义，附加在完成动词或活动动词后时也会具有进行义。近来对-tei-的二语习得研究发现，对二语学习者来说，-tei-附加在达成动词后具有的结果性状态义比-tei-附加在活动动词后表达状态义、进行义要更难以习得。英语和日语对状态的不同表达方式，是这一习得难点产生的原因。

Rosanna Sornicola 讨论了话题结构和左偏置结构的习得情况 (Ramat, 2003: 327-364)。类型学上的话题优先、主语优先的分类已经被普遍接受，汉语是典型的话题优先语言，而英语、法语是主语优先语言，主语优先语言中会出现左偏置结构，法语表现最典型。文章调查了三组学习者习得这两种结构的表现。第一组是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在学校学习法语，第二组是母语为法语的学习者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学习英语，第三组是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学习法语的情况。调查发现，第一组没有话题结构出现，作者认为这是教学因素引起的；第二组没有将母语中的左偏置结构转移到英语中，作者认为这是学习者对规范结构的固定印象引起的；第三组很少使用汉语中的话题结构，原因在于母语汉语和目的语法语的两种结构在语境中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更为接近。文章的结论是三组都表现出母语的很少影响到二语结构的习得，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在对比母语和目的语异同的基础上来讨论习得的规律和趋向，必然会讨论到母语和目的语特点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上面三项研究就母语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当然习得中的影响因素很多。如上述关于话题结构和左偏置结构的习得研究中提到教学因素的影响，又如对意大利动名词二语习得研究，研究显示高等级水平二语学习者比意大利语母语者更喜欢用动名词作为进行体的迂说式，这是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国内所见的关于汉

语二语习得的类型研究结论几乎都认为母语的结构类型对汉语学习有明显影响。

后面还会就这点作专门论述。

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第一种验证类型学蕴涵共性的研究是一般性的、理论性的研究，而第二种类型学框架下的语言对比研究，则是具体的、与二语教学实践关系更密切的研究。二语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总结语言教学的难点、重点，进行解释，提出解决办法，显然第二种范式更适合、更能满足这一要求。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有实证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两类。国内外关于关系从句习得的系列研究都是实证的研究，汉语的研究如李昱（2014）对汉语双及物结构习得的研究，郝美玲、王芬（2015），鹿士义、高洁、何美芳（2017）对汉语运动事件表达习得的研究，吴建设、莫修云（2018）对“把”字句习得的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有 Girliano Bernini 关于意大利语二语学习者的不定代词的习得研究，程潇晓（2017），郭风岚、刘辉（2017），高顺全（2017）对汉语的研究等。

三、形式与意义匹配的习得

语言研究就是要揭示出语言形式及意义的匹配关系，类型学研究从人类语言普遍存在的句法语义范畴出发，在跨语言对比中揭示普遍范畴在各语言中的不同表现，总结其中的共性。这样的研究充分反映出同一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功能或形式有同有异。

尽管多项二语习得研究都已指出形式的习得不等于意义功能的习得，但在类型学框架下，以范畴具有典型性、非离散性为基本认识的语言观影响下的二语习得研究，会特别注意到范畴的意义与功能习得的过程，形式的习得与意义的习得不匹配问题因此凸显出来，意义习得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研究都指向高等级学习者对范畴的意义与功能的理解与运用，都指出意义与功能的习得慢于形式的习得。如意大利语中动名词是动词的非限定形式，关系小句是动名词使用的典型的句法环境，动名词还可用作进行体的迂说形式，随着熟练度的增加，高等级的学习者了解了这些特征的语用功能，就会更多地使用动名词，甚至比母语者更多地在应该用进行体的地方用动名词。二语学习者对动名词的

使用情况也许可以用经济动因来说明：将不同的语义用同一个形式来表达以达到经济性的目的，但也表现出对动名词的运用不如母语为意大利语的人地道。

二语习得者在学习中会发展范畴的语法意义，使得形式与意义的匹配问题更复杂。Hendriks 对二语学习者的篇章复指手段的习得作了分析 (Ramat, 2003: 291-326)，Hendriks 认为话题结构和左偏置结构有两种主要功能：第一，对已知所指的再度引介；第二，使一个旧的所指变为新的。Hendriks 发现成人学习者在法语中的左偏置用法的篇章语用规则的理解上没有问题，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也很少将汉语中突出的话题结构用于法语，但是她也发现了在母语为汉语的法语二语学习者的语料库中这两种结构都具有引入新实体的功能，功能有发展。她还指出，话题结构和左偏置结构都有相似的语用功能，也因此，这两类结构在各语言的口语、书面语中分布复杂、使用灵活，本地人、习得者都在发展该结构的用法，特别是受到语境的影响而有灵活的应用。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最后提出，将高度变异且动态发展的习得过程与成熟语言能力的终结点挂钩是一种错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项研究中揭示的并不是二语习得者的错误用法，而是不同于母语者的使用情况，如频率高于母语者、在具体语境中语义的进一步发展等。类型学视野下对于意义习得进程的观察较以往要深入细致。

汉语研究方面，所见文献中除郝美玲、王芬 (2015) 对比了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习得情况外，其余研究都只研究中高级阶段习得情况，鹿士义、高洁、何美芳 (2017) 直接表明所研究问题只有到了高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才会较多使用，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不作为考虑因素，这也说明类型学视野的汉语语法教学研究关注的都是有复杂的语义和形式匹配关系的结构，因而一般超出了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使用范围。

四、母语和目的语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很多，包括母语和目的语的特点、学习者的参与、教学的条件等，但关注类型学特征在二语习得中的表现，必然会重点讨论母语和目的语特点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针对母语类型学特征对相关语言结构的习得的影响，汉语学界有非常细致的讨论。

李昱 (2014) 指出，在汉语双及物构式的变异形式中，有部分变异形式具

有跨语言或者跨类型的共性（汉语双宾语 VRT 构式），有部分变异形式则受到学习者母语语言类型的影响（介词结构）。文章还指出，母语和目的语的类型学特征决定了中介语的变异范围，从类型学视角指出中介语的变异空间以及变异机制，是该文一大亮点。郝美玲、王芬（2015），鹿士义、高洁、何美芳（2017）都发现 S 型语言母语背景和 V 型语言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典型运动事件表达结构“M+P”的习得不一样；对其他运动事件表达方式的习得是否受母语影响，不同表达方式的表现不一。程潇晓（2017）概括出这样的研究思路：多种母语背景学习群体普遍混用某些路径动词且混用表现一致，这可能是学习者受到汉语词义或句法的影响，因此可尝试从目的语出发探寻混淆原因；而单一或少数母语背景学习群体混用某些路径动词具有特异性，这可能是由于学习者受到母语词义或用法的影响，可以从母语角度探寻致误原因。在类型学研究如何运用到二语习得方面有了更具体的操作原则。吴建设、莫修云（2018）特别分析了朝鲜语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为何回避使用“把”字句，指出正是朝鲜语 SOV 语序与汉语“把”字句表面相似、内部有很多差异的特点造成了朝鲜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回避使用“把”字句，可以看到结构类型特征的抑制作用。郭风岚、刘辉（2017）将汉语的句法结构分为基本结构和次级结构两个层级，基本结构为主谓、述宾结构，次级结构为定中、状中、中补结构，观察发现，对基本结构语序的学习，二语习得者受母语影响明显，而对次级结构语序的学习则与母语的语序类型关系不大。可以看到，虽然汉语二语习得的类型学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是在类型学已经有较充分的研究成果的背景下开始的，因此对于母语类型学特征影响的范围和复杂性都有更深入的认识、更准确的描写，在具体研究程序层面也更具可行性，不过汉语学者普遍认为，母语的类型学特征会影响学习者对相关结构的习得，这一点与国外学者意见不一。

一般认为，母语的影响对初级学习者较大，随着二语熟练程度的提高，母语的影响越来越小。上述类型学研究显示，不同的语言项目的习得，母语的影响不同，有些语言项目的习得母语的影响很大，而且很顽固。郝美玲、王芬（2015）根据其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L1 中建立起来的路径信息的表述倾向一般是很难改变的，并指出这与国外相关研究有共同结论。随着汉语水平提高，S 型语言背景学习者能较快意识到汉语的表达习惯并靠近这一习惯，而 V 型语言背景学习者则没有明显表现，其根本原因还是其母语与目的语的表述习惯差异较大。

Mary Carroll 和 Chrictiane von Stutterheim 对叙述事件的视角习得研究也显示, 相关表达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考和表达习惯, 很难改变, 即使是十分熟练的高等级二语习得者, 也会保持母语的习惯。

五、类型学视野的二语习得研究的特点与优势

上面总结了类型学视野的二语习得研究的特点。类型学视野下的语言对比研究在对问题以及对比参项的选择上都极具深度和广度, 研究的结论反映出相关语言的重要特点。类型学视野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对形式与意义匹配的习得更关注, 甚至关注到语用层面的习得, 对高等级学习者的习得情况有更精确的描写, 这些也是以往二语习得研究较少注意、正在引起重视的方面。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要厘清各因素的具体作用并不容易。二语习得过程中什么是所有学习者共同的倾向? 什么是基于各语言的不同而产生的问题? 跨语言的视野可以在这两个方面有所推进, 给出一些较以往研究更加明确的答案。

国内类型学视野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上, 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与类型学研究相结合才刚刚起步, 汉语二语教学中运用类型学理论所做的研究还不多见, 我们文献检索到的公开发表的论文已经全部列在上文中, 可以看到研究只涉及了几个语法点, 如运动事件表达、语序、“把”字句、双及物结构、介词, 而且每个点的研究也只有几篇, 研究也只注意到了类型学成果对二语习得的意义, 而二语习得材料中的类型学意义没有关注到, 更多的问题都未触及, 研究的深度、广度都亟待扩展。类型学已经取得的丰富成果, 类型学在二语语法习得研究领域已经开始的有益探索, 对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语法教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

第三节 本研究的目标、内容

本研究结合类型学研究 with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法教学研究, 尝试从类型学视野对汉语二语语法教学做更多的观察与研究, 也尝试从二语习得角度出发观察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研究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 类型学视野的汉外语言对比、类型学特征对习得的解释力、二语习得和中介语理论对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解释力, 尝试进行类型学视野汉语语法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语法研究这两个领域的“跨域”研究，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吸收、运用类型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框架。

具体来说，本研究选择量词、多功能词“给”、结果补语（与连动结构相关）、使役句等类型学研究框架比较成熟、研究成果丰富、研究十分深入的类型学特征，这些特征同时也是汉语突出的语法特征，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语法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二语教学中学生的母语背景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本研究主要以东南亚地区学生为观察对象，并以日韩学生为主要比照对象。选择这一区域的学生原因是：目前关于东南亚地区学生的汉语二语教学研究相对欧美、日韩学生的研究较为薄弱，而这一地区的国家近年来汉语学习持续升温，无论是来华留学还是在本国开展的汉语教学都已经成为汉语二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又是著名的“语言区域”，对这一区域的区域类型学、语义地图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果，可以将类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到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研究中。与一般的汉语二语研究主要针对单一母语背景不同，本研究主要是对类型学特征一致的一组语言的汉外对比研究和汉语二语教学研究，讨论具有同一结构特征的一组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异同，并以此来解释教学中的相关现象。以语言共性为背景来讨论具体语言的个性特点是类型学的基本视角，同时针对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区语言背景学生的汉语学习，研究中我们将更多地结合与运用区域类型学、语义地图、语言接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讨论问题。

第二章 基于类型学的汉外语法对比研究

第一节 类型学框架下的跨语言个体量词对比

汉语是个体量词丰富的语言，个体量词学习的难点和重点在量名、名量的正确搭配。因此具体的个体量词所适用的名词范围，是以汉语二语教学为目的的汉语个体量词研究和汉外个体量词对比的主要内容，这方面有很多研究。^①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分析具体的个体量词和具体名词搭配为主，如讨论“条”“张”所搭配的名词及原因，或是具体个体量词之间的对比，如汉语的某个个体量词和另一语言中的某个个体量词的用法对比。而对汉外个体量词系统的对比，汉外量名、名量搭配的规律性差异则少有讨论。这与研究视角总是基于具体的个体量词用法对比、没有寻找更加概括的描写框架来观察有关。

个体量词是一项重要的类型学特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调查研究，类型学对世界各语言中的个体量词已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提出了描写世界语言个体量词系统的统一框架，指出个体量词是名词的分类系统。个体量词根据若干语义参项对名词进行分类，其中有些参项是基本参项，存在于所有个体量词语言中，这包括有生与无生、人类与动植物、事物的形状与功用，以及形状中的圆形、长形等，还有些参项在许多个体量词语言中广泛存在着，如软和硬、大与小等，不同的语言中基本参项结合不同的次级参项形成不同的个体量词，并进一步形成该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对名词进行分类。可见类型学是用一个统一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框架对各语言的个体量词语义系统进行描述，在这个统一的框架下更易于清晰地对比出各语言的不同，因此本研究拟运用类型学个体量词系统描写框架对比汉语和东南亚几种语言的个体量词。

类型学关于个体量词的一个重要认识是：个体量词是对名词的分类，因而

^① 针对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的汉语名量或量名搭配研究，重要的如何杰（2000）、朱庆明（1994）、张敏（2006）等以及本研究参考文献中所列的数本量词词典。

从名词的归属来观察某种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本研究选择了 700 个常用的汉语名词^①，考察它们在汉语以及另外三种语言中的分类，结合对各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的语义系统描写来讨论汉语与这些语言个体量词系统的异同。针对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的量名搭配研究很多，但都是以个体量词为纲，或举例式地说明，或是以问卷形式调查学生掌握量名搭配情况，分析学生的偏误，提出教学中应注意的量名搭配。如龙伟华（2004）在对比汉泰语量词时谈到泰语的动物量词 **ตัว**[tua:˥] 可以用于桌子，曾怡华（2007）归纳越南学生量词学习偏误类型和原因时举例性说明有“那条纸”“一只鱼”的偏误，胡永梅（2008）举例性指出泰国学生有“八头小鸟”“五只鱼”的偏误。杨宗雄（2006）专门针对泰国学生量词使用情况的调查涉及了 20 个使用个体量词的名词。但这两种方式所涉及的量名搭配都极为有限，对学生偏误的分析没有参考类型学研究成果，很难提出系统性意见作为教学参考，本研究基于一定数量的量名搭配进行考察、对比，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本研究选取了泰语、越南语、印尼语和汉语进行对比。Conklin（1981）列出如下语言序列图，最左边的个体量词最丰富、使用最频繁，从左往右量词的数量及使用率依次递减，印尼语和毛利语往左都是有个体量词的，中间的吉尔伯特语有度量衡量词和集体量词，最右边的霍皮语甚至连度量衡量词也没有：

本研究所选的语言都是个体量词型语言，这已是共识。其中泰语个体量词尤其丰富，越南语^②也有丰富的个体量词，但个体量词的使用较自由，很多名词都有直接与数词结合的能力，印尼语的个体量词数量比其他几种语言都少，有些名词不用个体量词，在图 2-1 中它位于有个体量词的语言和无个体量词的语言的分界线上。这三种语言分别属于侗台语、南亚语、南岛语，是东南亚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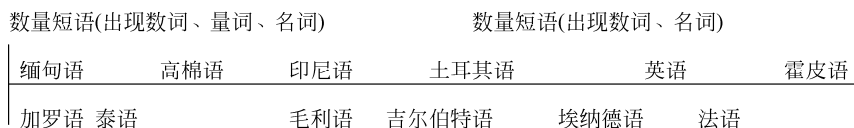


图 2-1 量词型语言序列

① 本研究考察的 700 个名词是从参考文献中所列的量词词典、旧 HSK 大纲及语料库整理所得，700 个常用名词见附录 1。这方面得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郑艳群教授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② 越南语的系属尚无明确结论，一般认为它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